



动态创新能力： 洞察中国式创新的新视角

张天悦

【摘要】由于创新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演化性，使内化于其中的创新能力成为持续激发创新活动的核心驱动力。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逻辑架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维持和增强创新主体竞争优势的能力，可视为一种动态创新能力。中国式创新凸显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谋发展的探索实践，呈现了基于中国情境的动态创新能力形塑过程。从异质性视角出发，正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特情境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分工协作、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双向嵌入、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并重，共同构成了这种动态创新能力的生成机理及演进路向。立足新征程，推进中国式创新可以从提升动态创新能力入手，夯实基础、补齐短板，着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中国式创新；动态创新能力；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动态能力理论

【作者简介】张天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5）01-0084-08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引发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并通过国际产业分工的重大调整，改变国家力量对比，重塑世界竞争格局。^{〔1〕}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始终将科技视为第一生产力，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针对性政策和措施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经济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向创新型国家迈进，总体创新能力特别是集成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以5G通信、人工智能、移动支付为代表的多个新技术和新业态发展位居世界前列，由此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

之路。中国式创新即是对这一丰富而独特创新发展实践的高度概括，可以理解为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表征，包括知识、观念、组织、管理、制度等多个层面创新在内的创新集合。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科技创新对国家命运、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2〕}因此，深入剖析中国式创新实践的学理内涵及其演化机理，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学理上的支撑，为后发国家以提升动态创新能力为重要抓手、实



现跨越式发展带来有益借鉴。

一、动态能力理论与动态创新能力

(一) 从创新到创新能力

创新是引入新的想法、方法或设备,以创造有价值的新事物或改进现有事物的过程。创新的实质在于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不断拓展对客观世界及其自身的认知与行为的过程和结果的活动。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提出了“创造性破坏”概念,即创新过程往往会破坏旧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而为新的机会让路,由此强调了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随后,Aghion和Howitt将“创造性破坏”首次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并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来自创新积累,而创造性破坏就是新发明取代旧技术的过程。^[3]可见,创新实则是一个由旧到新的替代过程或价值创造过程。对于创新主体来说,创新活动是能改造作用对象的外在行为表象,而内化于其中的创新能力是一系列使创新成为可能的条件和要素,因此是持续激发创新活动的核心驱动力。路风立足中国工业发展脉络,指出自主创新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更多体现为一种能力,即获取外部知识的条件可以影响自主创新的条件,但创新的效果更关键性地取决于自主开发的努力,而不是客观条件本身。^[4]因此,这种能力是多重条件作用下的内在形塑过程,既不可能与生俱来,也并非一成不变。

作为一种元能力或基础能力(meta-capability)^[5],创新能力通常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知识和技能,即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了解最新的发展趋势;二是资源,即能够获取、整合、重构相关资源,以支持研发和其他创新活动;三是组织结构,即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以提高决策速度和执行效率;四是网络关系,即能够与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以共享资源;五是战略方向,即具有明确的发展愿景和目标,能够识别市场需求并快速响应。面对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演化性的创新,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提升是创新主体化解创新风险、驱动转型发展、构筑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创新主体的不同层次,创新能力可进一步划分为国家创新能力、区域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

力、个人创新能力等,每个层次都有其特点和侧重点。本文聚焦中国式创新,更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关于创新能力的探讨多着眼于宏观层面,即关注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通过培育和提高创新能力实现持续创新发展。

(二) 从动态能力到动态创新能力

认识和解释竞争优势来源以及如何获得并保持,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重要问题。美国管理学者Teece等人在1997年首次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旨在解释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部分企业能够保持竞争力的原因所在。所谓动态能力,是指企业识别、整合、建立和重构内外部资源与能力,以应对环境变化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从构成要素来看,动态能力理论通常涉及感知能力、吸收能力、组织学习、灵活性、创新管理以及资源配置六个方面。从实现形态来看,动态能力是企业的组织或管理流程,这些流程承担了协调和整合、学习以及重新配置和转型的功能。^[6]Teece等认为,由于能力本身包含隐性知识从而具备内部结构的模糊性、多种能力之间的互相牵动以及能力形成的历史特殊性等原因,加之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商标和企业风格等方面的限制,企业的动态能力难以完全复制和被模仿,可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7]这至少说明,动态能力是考察现代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是否具备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评判。进入21世纪,动态能力理论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不断拓展,但学术界对动态能力及其价值创造作用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不过这些关于动态能力的定义呈现一定的相通之处。首先,动态能力表现为一种改变资源基础的高阶能力;其次,这种高阶能力具备创造性破坏的特性;再次,动态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路径演化性;最后,动态能力同时具备行为成分和认知成分,因而具有认知能动性。^[8]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逻辑架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维持和增强创新主体竞争优势的能力,可视为一种动态创新能力。考虑到创新本身是一个复杂和动态的过程,动态创新能力强调了内嵌于创新能力的动态适配性与自组织性。其中,动态适配性侧重外部作用下的及时响应与适时调整,自组织性则注重创新主体内部的不断优化与提升。围绕创新能力的五个方面,动态创新能力



可划分成以下五个维度。一是战略决策能力。要求创新主体具有前瞻性思维和综合决策能力,包括对市场趋势的洞察、对内部资源的评估、对未来方向的选择等。二是外部响应能力。要求创新主体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科技进步等外部环境变化,并基于这些变化及时进行内部调整。三是资源整合能力。要求创新主体能够有效整合、配置各类创新资源,以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确保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四是吸收转化能力。要求创新主体能够不断吸收新知识、新技能、新方法,并将其适时转化为自身竞争优势。五是组织合作能力。要求创新主体对内具有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管理机制,对外能够围绕创新资源共享、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合作渠道。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多是关注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态性,并就动态创新能力的主要特性、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其提升手段展开了丰富的探讨。^[9] 本文尝试将动态创新能力的考察对象由微观企业层面拓展至更为抽象的创新主体层面,以期洞察不同创新主体的不同创新模式、场域、路径及体系构建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二、理解中国式创新的独特情境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国的情境,转型的“所有制制度”、多样化的“技术体制”、多层次的“市场空间”、新兴的“全球网络”四位一体的中国情境,决定了中国式创新的独特性和重要性。^[10] 而这种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范式更加匹配的战略异质性和制度异质性,是后发国家在新技术和新产业实现领先的重要基础。^[11]

(一)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观照

创新是推动生产力提升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尽快实现从科技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赶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多个重大科技领域实现了从追赶者到并跑者乃至领跑者的身份转变,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全球创新版图加快重构,为后发国家“超越追赶”创造了机会窗口。

推动四化“并联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鲜明特色,不仅突破了现代化传统发展的路径约束,也为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尤其是在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在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等方面,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巨大的客观现实既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人口红利,还使我国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规模、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庞大的本土需求有助于激发超大规模市场的创新活力,吸引并集聚全球创新资源要素。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辅相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在从早期的最终产品组装和低端零部件配套生产、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更高附加值的高端装备制造生产及产品设计、核心技术研发、品牌建设等服务贸易形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制造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需要面对西方国家愈加严格的出口管控和技术封锁,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化解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力度;也需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12] 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我国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旨归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13]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鲜活实践构筑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首先,以推动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力为目标导



向。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其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而管理、科技、信息等要素在现代社会生产中起到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创新不仅是科技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也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质变跃迁，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力，需要让创新起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渗透性、扩散性优势，将科技与生产力要素深度融合，以此提升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丰富劳动资料的结构内容、扩大劳动对象的涵盖范围，促进技术成果更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其次，以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为手段。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是那些能够引领产业乃至社会向新形态转变的创新活动，往往预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国际科技与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科技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主导作用愈发突出，必须有组织地推进战略导向的原创性、基础性研究。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并由此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我国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关键力量。

再次，注重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并不限于创新活动本身，还包括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有效转化，需要将其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产业层面的新型生产力系统结构，表现为新型要素优化组合形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4]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带来的生产能力提升和效率改善，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前沿技术的引领，并要求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同频共振。

最后，以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现实旨向。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过程具有一致性，决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种高质量发展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也为我国发挥创新驱动作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而聚焦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明确了发展主题与现实旨向。

三、中国情境下动态创新能力的形塑机理

动态能力形成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位势即资源禀赋，动态能力形成的过程表现为演化与共演路径。^[15]进入21世纪，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致力于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围绕制造业布局的竞争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博弈日益加剧。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抓住机遇，采取及时的应对策略，依靠动态创新能力不断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进而在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至关重要。中国在技术赶超过程中形成个体行为的自适应性、互动关系的演化性、激励结构的兼容性和系统反馈的持续性，都彰显了中国式创新的独特性。^[16]可见，中国式创新源于历史传承、时代变革、国情需要共同作用下的催生与演进，是基于复杂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在战略方向选择、政府企业关系、产业组织形态、基础设施供给等多个方面作出的动态适应与调整，由此呈现了基于中国情境的动态创新能力形塑过程。为此，本文尝试从异质性视角出发，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分工协作、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双向嵌入、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并重三个维度为关键着力点，结合战略决策、外部响应、资源整合、吸收转化、组织合作五个方面，探讨中国情境下动态创新能力的形塑机理。

（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分工协作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对于中国来说，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多着眼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适配。这种动态适配是指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实际需求以及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配、最优边界和协同机制，以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和社会发展目标。这种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静态关系，而是一种长期动态的相互影响。中国式创新实践始终贯穿中国



经济体制变革之中，成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动的生动体现。换句话说，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分工协作深刻形塑了中国情境下的动态创新能力。

一方面，始终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要求发挥党和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不断深化对科技、创新和发展问题的认识，以科技专项计划、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性科学计划和工程等方式，对关键技术领域攻关进行战略谋划与决策部署。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型科学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理空间和技术支持。强化教育、科技、人才有机结合，实施各类人才计划，吸引和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人力保障。制定实施各项产业政策，通过设立产业园区、提供财政补贴等措施，引导和支持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推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交流合作，扩大国际合作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创新链，等等。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显现，企业、企业家和投资者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调节资源配置，促进资源向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和项目集中。市场竞争又能促使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以维持竞争力，从而推动整体的技术进步。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市场投资者则为早期科技创新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独特的企业家类型和精神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能够实现知识与技术的有效对接，推动重点科技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突破性创新，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进程。

此外，“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基于各自角色的协同互促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于传统的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更加注重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强调政府在关键领域的支撑和指导作用，从而将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发挥了独特优势。例如，通过统筹规划、优化资源配置、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等方式，我国在高速铁

路、高温超导、纳米科技、量子通信、载人航天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政府还通过强化市场监管，健全法规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动力。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我国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尤其是在面对外部“脱钩断链”风险时，能够迅速调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等各方力量，既合力解决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又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中汲取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

（二）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双向嵌入

两个市场是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种资源是指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服务以及标准、规制等，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17]中国始终坚持以开放促改革、谋发展，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推进自主创新，为塑造并提高动态创新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水平，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这一经济追赶时期特有的创新发展模式，即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关联互动的一次尝试。从其形成、确立、实施、数次调整直至最终淡出的发展全过程可知，处理好技术引进、市场开放、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乃至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18]随着中国自身经济水平和技术实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国逐渐形成了双重的角色定位，既是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循环的积极参与者，又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构建的新经济循环的关键引领者。^[19]中国式创新实践逐步转向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和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模式，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呈现一种双向嵌入的紧密联系。2020年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适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以国



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同时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和竞争优势,助力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提高对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的全球性影响力。^[20]

从中国式创新实践的角度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突出位置,进一步放大和凸显了立足国内市场的经济循环优势,强调通过研发国际化、创新技术与品牌“走出去”以及促进国际人才流动,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促进更大市场、更多资源、更宽领域的有机联通。因此,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更高层面和更广空间良性互动,增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无疑构成推动中国情境下动态创新能力形塑乃至提升的重要机制。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我们引领商品、资本、信息等全球流动的能力,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21]

(三) 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并重

中国经济已经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的集约型增长。放眼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为中国式创新提供了“范式转变”的战略机会窗口。中国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确立的技术范式制囿,实现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可持续发展。^[22]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旨在通过协调发展与安全两大方面,切实筑牢自身动态创新能力,确保国家的持续稳定和长远繁荣,是我国因应时代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高质量发展强调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不是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因此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23]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前三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能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破坏

等多重后果。始于21世纪初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是一场全新的绿色工业革命,强调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力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绿色低碳、数智化、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24],加之我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从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人才支撑等多个方面,为推进中国式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成为形塑这种动态创新能力的重要动因。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如今,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科技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和战略安全的关键要素。^[25]不同于西方国家源自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中国式创新是在逐步消化吸收已有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发展。2018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企图通过贸易战遏制中国发展,在芯片和半导体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针对中国的“卡脖子”困境。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固,仍面临创新链割裂、产业链受阻、资金链收缩等风险挑战。无论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自身科技实力的壮大维护科技安全,还是充分应用科技实力,为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强大科技支撑^[26],都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特别是经济发展与产业安全,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加快提升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以动态创新能力提升推进中国式创新的实践方向

动态创新能力因其动态性而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由中国式创新实践催生的动态创新能力,也会因自身的不断提升而助力中国式创新的进一步演化。基于中国情境下动态创新能力形塑机理的探讨,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创新可以从提升动态创新能力入手,不断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人才机制等改革创新,夯实基础、补齐短板,着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第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



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动态适配，处理好政府越位、缺位与市场失灵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具体到创新领域，就是要赋予企业创新更大自主权，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通过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等，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挥企业作为“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的作用，形成“揭榜领题”“赛龙夺锦”的创新局面。

第二，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当前，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迫切要求我国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一方面，推动教育理念、体系、制度、评价、治理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在全社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激发、保护和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推动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文化环境，更好地调动各类人才创新创业、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推动形成内外双向嵌入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围绕科技创新法律、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技术标准、科技成果转化等，积极推动代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新兴技术、标准、管理以及重点产业、高端品牌“走出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同时，还要稳步提升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一方面，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催生更多的高新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需求。另一方面，在平台建设、人才引进、技术转移、海外布局等方面，深入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环境。

第四，进一步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

型生产关系的内在要求。一是要坚持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不断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二是要统筹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升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之间的协作水平，使之有效链接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创新各环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三是要推动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加强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围绕科技安全、产业链安全以及经济安全构建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针对关键技术领域制定风险评估和预警准则，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着力构建适应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的科技创新格局。

五、结语

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保持领先地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由于创新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演化性，内化于其中的创新能力是持续激发创新活动的核心驱动力。而创新能力通常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实力和制度环境基础之上，并在复杂情境的形塑下呈现一定的动态适配性和自组织性。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科技差异，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动态创新能力，这种异质性与一国在创新战略、制度、组织乃至具体活动层面的“异质性”密不可分。因此，不同时代背景下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谋发展的中国式创新实践，呈现了一个基于中国情境的动态创新能力的形塑过程。在遵循创新一般原则和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本文从异质性视角出发，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逻辑架构，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特情境，分别从政府与市场、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三个维度，审视了基于中国式创新实践的动态创新能力的形塑机理，探讨了以动态创新能力提升助力中国式创新演进的实践方向。旨在为明晰中国特色创新



之路的学理内涵提供不同的理论视角,同时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学理支撑。

本文提出了动态创新能力,并基于中国情境进行了理论延伸,但通过构造数理模型形成更为直观的规律性认识以及趋势判断,或是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评析,从而生动展现中国式创新在新征程上的发展图景,将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创新为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抢抓技术变革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借鉴启迪。这一丰富而独特的创新发展实践需要更多领域、更多层次、更多维度、更多尺度的学理化阐释,特别是围绕创新经济学及其体系构建,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与关键议题,以更好地回应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 〔1〕阴和俊:《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为国家发展和安全提供战略支撑》,《学习时报》2024年5月22日,第1版。
- 〔2〕周育先:《展现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国企担当》,《经济日报》2024年4月21日,第1版。
- 〔3〕P. Aghion, P. Howitt,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vol. 60, no. 2 (1992), pp. 323–351.
- 〔4〕路风:《新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2页。
- 〔5〕D. J. Collis, “How Valuable Ar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5, no. S1 (1994), pp. 143–152.
- 〔6〕〔15〕吴晓波、徐松屹、苗文斌:《西方动态能力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 〔7〕D. J. Teece, G. Pisano, A. Shue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8, no. 7 (1997), pp. 590–533; D. J. Teece, “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8, no. 13 (2007), pp. 1319–1350.

〔8〕苏云霞、孙明贵:《国外动态能力理论研究梳理及展望》,《经济问题探索》2012年第10期。

〔9〕王昌林:《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三要素》,《企业管理》2017年第5期;焦豪、杨季枫、应瑛:《动态能力研究述评及开展中国情境化研究的建议》,《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10〕吴东、吴晓波:《技术追赶的中国情境及其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11期。

〔11〕贺俊:《新质生产力问题的理论缺口与经济学的“异质性”分析视角》,《财贸经济》2024年第8期。

〔12〕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2年9月20日,第1版。

〔13〕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14〕黄群慧:《读懂新质生产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第5页。

〔16〕安同良、魏婕:《中国式创新:技术赶超的成功范式》,《学海》2024年第1期。

〔17〕王镭:《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红旗文稿》2024年第6期。

〔18〕张天悦:《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式创新的演进逻辑》,《改革》2024年第5期。

〔19〕王跃生:《全球经济双循环:全球化结构新走向与中国应对》,《新视野》2023年第2期。

〔20〕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3日,第2版。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72页。

〔22〕X. Wu, D. Wu,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Catch-Up and Beyond,” *China Economist*, vol. 18, no. 4 (2023), pp. 101–114.

〔23〕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转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页。

〔25〕喻思南:《筑牢科技创新的“安全之基”》,《人民日报》2024年8月27日,第5版。

〔26〕王志刚:《加强自主创新 强化科技安全为维护 and 塑造国家安全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日报》2020年4月15日,第11版。

〔责任编辑:田 华〕